

05.10

巴彦淖尔盟党史资料

第一辑



中共巴盟盟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

巴彦淖尔盟党史资料

(征求意见本)

第 一 辑

中共巴盟盟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

一九八五年六月

再 版 前 言

盟委党史办一九八一年与盟地方志办合署办公，于一九八三年共同出版了《巴彦淖尔史料》第一辑。此后，党史办与地方志办分设，并分别出版史料。由于第一辑印的份数少，根据广大读者的要求，我们将《巴彦淖尔史料》第一辑中的党史资料部分再版重印，并新加了《艰苦奋斗的一九三六年》、《长征路上》两篇文章。书名为《巴彦淖尔盟党史资料》第一辑。以飨读者。

中共巴盟盟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

一九八五年六月一日

风 雨 十 六 年

——河套地下革命斗争回忆之一

刘进仁 忆述

一 建 立 支 部

一九二七年，在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势力的支持下，国民党新右派蒋介石发动了“四·一二”反革命政变，蒋介石代替了北洋军阀，导致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失败，白色恐怖笼罩了全国。

“从此以后内战代替了团结，独裁代替了民主，黑暗的中国代替了光明的中国。”当时，绥远和全国一样，国民党反动派活动猖獗，形势一天比一天紧张。为了适应形势的变化，绥远省党组织决定有计划地疏散党员，一方面对付敌人的白色恐怖，另一方面转入地下，深入农村争取群众，发动群众，开辟农村根据地，开展革命斗争。

七月的一天，绥远地委组织部长路作霖，正式通知我离绥赴河套开展工作，我欣然服从了党的分配。我按照党的指示，当即离绥到了包头，

然后乘木船，沿黄河逆水而上，到达了临河。由于河水猛涨，航行艰难，几百里的水路走了一个多月。

到临河后，我首先找了李春秀和王汝贤二人，当时李是三区代表，王是东关小学教员，他们都是从反天主教而走上革命道路的。李春秀远在“五四”运动时，在萨县巴拉盖天主堂教会学校上学期间，就鼓动和组织学生罢课，反对天主教。一九二五年“五卅”运动时，我放假回套，曾在蛮会与李春秀及王汝贤有过联系，并将带回去的一些关于“打倒帝国主义”、“取消不平等条约”等宣传品送给他们。由于他们亲身受过帝国主义与不平等条约的迫害，看了这些材料后，引起了共鸣，就积极行动起来。他俩当时都在蛮会教会学校教书，就组织学生罢课，反对比籍神甫林半吊子。

王汝贤画了一个洋神甫，跪在一个持枪的中国人面前等待枪毙，并写着：“洋灵魂下十八层地狱。”这画被林半吊子发现，见了王汝贤就打，结果反被王打倒在地，这是洋教士从来没有遭受过的莫大污辱。当时人们听到这事后，无不拍手称快。事后，王汝贤被教堂取消了教员资格，不准再进蛮会城。李春秀支持王汝贤的行动，毅然也离开了教会学校，到了临河县城。因官府

和教堂有矛盾，他俩的行动得到了一些上层人物的支持和同情，经活动李春秀当了三区代表，王汝贤到东关小学当了教师。

由于我了解他俩的过去，又经过一段的调查和考验，确实不错，他们又积极要求入党，我就介绍他俩和一个叫王鞋匠的秘密入了党，时隔不久，我们四人成立了临河支部，我任支部书记，李春秀同志担任组织兼军事工作，王汝贤担任宣传兼农运工作。

当时临河是国民党的势力较薄弱的地方，既离归绥远，又是绥宁边界，土匪部队各霸一方，各自为政，相互对峙。包头以西由王英的护路队占据，临河以西至乌拉河是苏雨生的地盘，临河城里驻扎一个晋军营，陕坝、乌兰淖、蛮会操于天主堂手中。这种混乱的局面，对我党开展工作是有利的。地委指示我们：“隐蔽好，秘密发展党员，壮大革命力量，迎接新的革命斗争。以绥远斗争的经验教训，做好农运、军运及青年知识分子工作。”

支部成立后，根据河套当时的形势和上级党组织指示的精神，拟定了支部工作计划。总的原则是：深入群众，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，通过斗争发展组织，壮大革命力量，并要做好隐蔽工作，既要抓住主要斗争目标有的放矢，还要机动

灵活地确保我们的力量。方法是：以统一战线的办法壮大革命力量，以公开合法的工作来隐蔽秘密工作，利用“上层”掩护“下层”。具体步骤是：第一步先拿到工作阵地，找到公开的职业以作立脚点；第二步再从反帝开始，开展全面工作。

二 合 法 身 份

支部成立后，我和李春秀、王汝贤商量，党的工作先从哪打开局面？我们一致认为，从教育上打开局面最有条件。当时临河全县只有水桐树庙、同元城两地各有一处私塾，县城东关有一所半私塾性质的小学，全县没有一所公立学校。因此，群众对开办公立小学要求十分迫切。天主堂统治的地区，他们为了以迷信奴化、毒化青少年，办了许多学校。陕坝有男女两个高小，三盛公还有相当于中学的神学院，基本上成龙配套，形成了体系。由于没有学校，许多非教徒也把子弟送到了天主堂学校，估计当时在教堂学校上学的人数有一千六、七百人，算上三盛公就有二千三百多人。再则，一九二四年以北京学者的名义，召开了一次中华全国教育会议，提出过收回教堂教育权的问题。

这样在教育界开展工作有许多好处：一是广

大群众盼望有自己的学校，以办学为名可以串联和发动群众；二是可以发动知识分子；三是人们对天主教堂非常痛恨，夺回教堂教育权的斗争群众易于接受；四是可以麻痹上层，利用县政府和一些官吏曾表示办学的义举，得到他们的同情和支持。

为便于以后开展工作，我们就开始积极活动，寻求公开合法身份。

我回临河县以中学肄业生的面目出现，当时，一些上层人物只以为我是国民党绥远省党部委员，又是初换青天白日旗，他们对我还有点望而生畏。利用这种有利条件，我就在教育界开始了活动。当时教育局长王丕卿，他是一个老夫子。一九二七年初，他当过几个月的临河设治局长，卸任时被接任的孙国栋讹诈过五百元大洋。有些人为之不平而联名告孙，李春秀给我去信，我在绥远曾帮过他的忙，给了孙极大的打击。因此，我到临河王丕卿对我非常热情。他也想作出点成绩，对我提出办学的想法表示支持。在我的说合下，王丕卿把李春秀从三区调回来当了视学，开始建校的筹备工作。

临河设治局长孙国栋大概是害怕的原因，见了我更为殷勤，请客招待并委任我为临河教育督导员。虽然这是一个空名义，实际在我看来是个很理想的职务。

当时河套是大地主兼地方董事专权的局面，财务、水利与四个区的区长等重要职务都由他们分掌，把持一切，任意而为。他们吞食流通券，贪污军粮税物，霸占土地，奸污良女。这些情况我们都知道，他们怕再落个孙国栋的下场，对我也表示欢迎。

这样我和李春秀取得了合法身份，开始了建校活动。

三 第 一 回 合

兴办学校这是反动统治者一贯口头上所标榜的，但都是空谈而已。当我们和教育局提出立即修建学校时，孙国栋口头上同意，但又以没钱为借口让推迟修建。我们知道孙又在耍滑头，来个先斩后奏，逼他上梁山。经李春秀同志和王丕卿的努力，以七凑八拚的办法搞了些木料，开始动工。

这时，听说绥远党组织遭到破坏，支部及时研究了对策，要提高警惕，防备组织遭到破坏。同时决定我到宁夏找党的关系，如找不到再到武汉。到宁夏计划找西北军与内蒙人民革命党的关系，因为西北军中有不少我党的同志。在内蒙人民革命党方面，有李若愚、王德尼玛和以后叛变革命的白云梯。我在九月间到了宁夏，一打听西

北军已经变样，白云梯已经叛变，李若愚同志情况不明。我知道事情坏了，如一露头叛徒白云梯就会知道，有被捕的危险，武汉也失去了想望，只得返回临河。

十月间我回到临河时，学校已经盖起两座教室与八间房，连原有的四间共十八间。在我未回临河的前半月，已由李春秀同志主办，请了一个老秀才赵兴安当教员，并把东关学校原来的学生招收来，已经开了学。我回来就正式担任了校长。值时，驻守临河城里的晋军撤退，晋军县长（当时已改为县）也随军离去，就在这三不管的空子里，王文辉当了临河县长。他为了维护其地位，对我们办学也示以支持。这样我们的工作比较顺利，到冬天学生达四十多名。

一九二七年冬，全国的形势有所好转，南昌起义、秋收起义、海陆丰起义给予了我们极大的鼓舞。我们在支部会上研究决定，继续以办学为名，开展反帝反封建斗争，并派李春秀同志到蛮会、陕坝、乌兰淖一带活动。乌兰淖有个叫温七斤子的人，是个反天主教的积极分子，他原是乌兰淖教会学校的教员，因反教会革职。我们利用他的这种精神，由教育局下令让他在那成立公立小学。天主教的洋神甫说：“这里是我们的地盘，不准别人成立学校。”我们说：“你还占着我们的

地盘，赶快滚出去。”当时教育局设在小学，有些重大事情由我来负责，我们坚决办这个公立学校，与天主堂展开斗争。李春秀同志以教育局视学身份帮助创办。在当地群众的支持下，再加上李春秀和温七斤子的努力，学校很快办起来了。

比籍神甫林半吊子（后到了乌兰淖尔教堂）看到办起了学校，非常气愤，他一方面用教义威胁学生家长不让学生到公立学校念书，另一方面派他的爪牙打钟老汉到学校捣乱。这个老汉开始是手持一根大木棒，在街上吓唬上学的孩子，不让他们到公立小学上学，学生们根本不怕他的威胁。这个家伙还不死心，后来索性跑到学校乱打一通，并喊着：“神甫的命令，不让你们立学校，你们是魔鬼学校。”在他的起哄下，学校被哄散了。

温七斤子没办法，跑到县政府报告，县长和教育局长有点怕洋人，对这件事唯唯诺诺不敢处理。我见王文辉畏首畏尾态度犹豫，马上写了一个条子，大意是说中国让他们（指洋教士）传教，并不是占中国的地盘，就是不平条约上，也没有规定不准中国人在中国的领土上办学校，更何况这种不平等条约我们现在已不承认。这是一个国家的主权问题，政府官吏是职责所在，怎能容忍这种丧权辱国的奇耻大辱呢？现在应当马

上办理这个案子。

当时，有些地方绅士也同意我的看法，他们说：“刘校长提的对，不平等条约上没有这一条。”这时都认为林半吊子是不可理喻的，非给点武力不行。让我带上几个护路队的兵去办理这件事情。为了办事有依据，不让县政府推卸责任，我让县政府给出了个指令。我们到了乌兰淖，温七斤子详细汇报了情况，并说打钟老汉仍继续捣乱。我听了后立即派兵到天主堂抓这个走狗。这几个兵马上行动，进了教堂院二话没说便朝天鸣了一枪。林半吊子听见枪声，知道事情不妙，吓得魂不附体，慌忙从后门偷跑了。抓来打钟老汉后，我问他为什么捣乱，他说：“我是听林神甫的命令办的，我是吃人家的饭，捞人家的钱。”洋奴气十足，当时把他管了起来。这时候又把三甲公会负责人叫来，该人是天主堂的会长，是一个典型的洋奴。我对他不客气地说：“你是政府系统的负责人，对于国家办学校是有责任的，在你们村里出现这种事，你为什么不管？”这个家伙吓得直哆嗦，点头哈腰地应承负责把公立学校恢复起来。还答应把天主教学校的四十套桌凳搬来让公立学校使用，让打钟老汉给公立学校拉四十车柴禾，如果以后再有人捣乱，完全由他负责。

我于当夜在反教会积极分子金良家里开了群

众会，在会上讲了形势，揭露了林半吊子和天主堂的种种罪行。也谈了大家要觉悟起来，为了培养自己的子女，把公立学校巩固下来。群众非常拥护办学，表示大力支持。第二天学生们都兴高采烈地到了学校。

天主堂并不甘心失败。林半吊子跑到三盛公找他们会长狄文化神甫，谈了乌兰淖的事。狄出面告到归绥，说：“临河两级学校校长刘进仁带兵鸣枪示威，宣传共产主义，捣乱天主堂治安。”

一天，王丕卿告诉我说，三盛公天主堂的狄神甫把我告了，省政府下来了指令。我一看指令，上面写着：“据天主堂司铎狄文化呈报，共产分子刘进仁带领人马到乌兰淖鸣枪示威，扰乱地方治安，宣传共产主义，速予查办。”下边案语是：“查刘进仁确系共产分子，见电立捕，速解来绥，以凭核办。”王丕卿有点害怕，为了使他们对我不发生怀疑，便理直气壮地说：“这是一场官司，它不能只听洋人一面之词。天主堂捣乱学校，这不只是我的官司，也是县政府、教育局的一场官司，我要是输了县政府和教育局也就算输了。”他们一听也觉得有道理，县政府研究决定，第一，让我暂时隐蔽起来，少出门，防止绥远派人来看见。名义上让王文辉的女婿接替了

我的校长职务，实际上仍让我继续主持两级学校的工作；第二，搞到三甲公会的具结完案的字据，有了字据这个案子就可呈报完案。

县长王文辉马上签字传来乌兰淖三甲公会负责人刘三保、段富治，立即开庭审讯。我们为了给县长出主意，让李春秀和王丕卿坐在大堂后面，作为策应。

开庭时王文辉就问：“你们是中国人的还是外国人？”

刘三保答：“回大人老爷，我们是中国人的。”

王问：“你们担任甲长是给谁当的？是对谁负责？”

段答：“是对政府负责。”

又问：“那为什么林半吊子捣乱学校你们不管？”

这两个人一看风头不对，赶忙说：“这是林的胡闹，我们没有负起责任。”

又问：“刘进仁到乌兰淖有无轨外活动？”

俩人同答：“没有。”说出这句话就达到审讯目的了，当堂画押，送到狱中。然后他俩写出了书面材料，说狄文化向绥远的报告“完全是无理的”，刘进仁并无“轨外行动”，经县批准具结

后释放。这俩人气不过，去找林半吊子，林也无可奈何。然后又到陕坝天主堂找会长王乐天，王把他俩骂了一顿。过了两个月，绥远都统换了人，案子也就没事了。

为了与天主堂争夺教育阵地，李春秀同志到陕坝、蛮会一带活动，动员天主教堂的学生到临河两级学校上学。先后动员了六、七名较大的学生，退出教会学校到临河上学，如革命烈士訾秉杰就是其中之一。有的天主教会长的儿子也退出了教会学校，到了临河。因此，陕坝天主教的洋神甫鲍某，对李春秀最恼火。

有一次，李春秀同志到天主堂高小动员学生，可巧碰上了鲍某，企图阻拦。李春秀愤怒地说：“咋啦！这是你们的地界？这是中国的地方，怎么不许中国人来？我是县里的视学，到学校是我的责任，你要干涉可就没有你的好处。”鲍知道李春秀不好惹，他怕再落个林半吊子的下场，灰溜溜地走了。事后打发他的狗腿子来给李说好话，央求再不要来动员学生了。李春秀声色俱厉地说：“你们是不是中国人？”狗腿子直点头。“你回去告诉姓鲍的，我这才是开始。”之后，李春秀经常到教会学校动员学生，有一次凑齐了六、七个学生，他自己花钱雇了一辆牛车，送到临河县城上了学。有两个学生膳食费困难，

我们党员同志出钱包了下来。

一九二八年暑假，在蛮会建立公立学校，天主堂扬言不让在他们地界内办学校，由于多次较量他们吃了苦头，因此，只是利用教条暗中破坏，不敢明目张胆地捣乱。我们才不管他那一套，借了民房办起了学校，一开学就有八十多名学生，比天主堂的老学校人还多。由王汝贤任校长，聘请了一个上过私塾的商人当教员。从此，蛮会的工作也有了发展。

四 福 祸 同 来

前段工作虽然遇到了许多麻烦，但总的说来还是顺利的。可是，我们与上级党组织失掉联系快半年了，就象娃娃失了娘，没有依靠。支部研究要千方百计地尽快找到上级党组织。

一九二七年十月，奉军赶跑了晋军而占了绥远，勾结晋军与我党为敌的国民党匪徒也跟着逃跑。我们考虑到党在归绥工人中基础较好，于是给归绥毛织厂技术工人党员钟金声去了一封信，信上编了一段话：“河套有很多绒毛，资金也有了，打算开毛织厂，就差一个老师傅，你们如有老师傅给我们介绍一个，弄上付机器就可以开工了。”

过了几天就接到来信，具名是贾昕晨（这是

李子光同志的别名，他原叫贾一中）。信上说，他已结了婚，要搬上女人住娘家去，还写了些别的话。我一看就知道这是组织内部的信，等夜深人静后，关好门窗，我和李春秀同志先用水湮湿一角，未出来字迹，然后用灯烤，这一下烤出了红字，这是用矾水写的。大意是：你们建立了组织，我们知道了，望赶快把建立组织情况报来，还说杨曙晓同志已出狱，绥远特支已建立。并提出临河支部通讯地址在学校是否合适。

找到了上级党组织，我和李春秀情不自禁地流出了热泪。接着我们把支部工作计划及情况向上级党组织作了汇报，上级党组织来信同意了计划和肯定了我们的工作。

一九二八年二月我们和上级党组织接通关系后，每月通一封信，既知道了当前的形势和方针政策，又得到了对我们工作的明确指示，使我们的工作有了指路灯和引路人。

接通关系后，我们的干劲更大了。我这个校长顾了里又顾外，从早忙到晚，但也不觉得累。那时，在教师里我们的力量很单薄，支部决定招聘几名进步教员。我就给萨县的高立亭去信，高原是候补团员，让他来当教员。高接到信后，碰见曾在狱中出卖过杨曙晓同志的叛徒崔书明（因高不了解崔叛变的情况），便把我给他写信的情